

新视角中的印度：敏感而自信

蓝建学

印度对大国地位的敏感在印度洋海啸救援行动中显露无遗。南印四邦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属于重灾区，至少有15,000人丧生。不过，印度不仅拒绝外援，而且工作重点似乎放在援救他国上。印度在灾后立即派出4艘军舰到斯里兰卡、3艘到马尔代夫、2艘到印尼协助当地救灾，同时出动空军空投救援物资。

媒体分析印度拒绝外援的可能是担心其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军事基地泄密，不过印度驻美大使罗南森（Ronen Sen）的解释可能真正道破天机：“印度加入处理海啸危机的‘核心国家集团’（还含美、澳、日、加、荷），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主要能力的国家。我们在印度洋有强大的海军。为什么叫印度洋呢？因为它一直是印度的势力范围嘛！多么可悲，人们得透过印度洋海啸才意识到印度版图之大。”

笔者以为，接受外援可能被印度视为影响大国形象的行为，尤其是考虑到印度还处于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关键阶段；显示印度的军事存在、表明印度洋是印度人的势力范围，至少是考虑重点之一。当然，印度默认美国出现在其“势力范围”内，很可能是由于布什总统吊唁时的一番话：“美国感谢印度在救灾问题上起领导作用。我们成立能干的核心集团，十分强大的印度理应是成员。”

印度大国地位的原动力

由上可知，印度对任何外部势力接近其边境都会产生本能的膝跳反应。实践中它时常对小邻国恩威并施，施加谨慎的幕后压力，斩断它们引入外力的任何可能。不过，若考虑到印度的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和战略思维，其敏感就不难理解。具体说来，印度大国梦的原动力至少包含如下几点：

首先来自英国殖民主义衣钵的传承。英国殖民者曾以印度为中心在东方建起庞大的帝国体系。1947年印度独立后该体系基本瓦解。作为核心的印度觉得继承英国人留下来的遗产乃天经地义，比如在次大陆的霸主地位、与南亚小邻国在外交和防卫上的特殊关系、以及印度对中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印度洋更是被印度战略家私下列为印度的“内湖”。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进一步阐述，“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

当然，印度具备作大国的资本。印度的国土面积占世界第七，人口占世界第二，还扼守着亚太地区大国的海上航线。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还提到，印度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也使印度人觉得自己有对别国说教的资格。换句话说，辽阔的国土、丰富的人力资源、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则是印度大国梦的物质支撑，而其大国资本的“软资源”则来自其历史和文化。2005年初辞世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迪克西特

（J. N. Dixit）曾这样分析：印度的领导地位自然也应当当之无愧，因为：在亚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印度第一个赢得独立，印度对这些国家的积极支持对它们的独立

和解放做出了贡献；亚洲许多国家的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应被视为亚洲社会文化基础的源头。

印度对区外大国的敏感还可溯源至印度国内的种姓制度。据斯蒂芬·科恩研究，这套制度是根据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衡量他人、同时也被他人衡量的一种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可能来自高种姓的领导人一旦遇到外国人对自己或自己的国家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蔑视，都会极为敏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敏感是自大与自卑的混合物。如上所涉，印度虽十分担心美军在海啸救援后可能会赖在南亚不走；但在得到美国总统的恭维后还是加入美国领头的“核心集团”。

印度对外来势力可能会威胁其大国地位的担心，与印度战略家的思维习惯也有关系。印度的国家战略文化深受“蔓荼罗圈模式”即“邻国圈理论”的影响。该理论源自古印度孔雀王朝大臣侨底里耶的《政事论》，其假定存在许多土邦：任何一个土邦都有自己的邻居圈，此时的友邻可能就是彼时的敌人；不能相信邻居，实力不足时就可以施展诡计来战胜自己的邻国。

新视角中的印度

作为印度“邻国圈”中的最大成员，中国长期被印度视为其大国梦的障碍和威胁。作为互动的结果，中国人对印度的印象也比较消极，往往还带着莫名的优越感。虽然印度崛起与否见仁见智，但人们对它在冷战后迅速发展这点并没有争议。印度是中国企业家尚待开发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在一些方面如金融市场、证券市场、软件产业、大战略决策，印度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印度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的自称不能算是吹嘘。比如2004年的第14届印度人民院直选共有6.7亿人有投票资格和70万个投票站；由于人数太多，选举得分成4个阶段进行，前后历时21天，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尽管伴随些许暴力冲突和选民盲从，此次大选非常成功：在改革中获益不多的印度下层百姓把踌躇满志的瓦杰帕伊政府选下台，平稳实现政党轮替。尽管曾经受到尼赫鲁的铁腕治理、英·甘地的紧急状态的冲击，印度的议会民主体系从1952年稳定运转至今。尤其是对照不时发生政变的南亚邻国后，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值得尊重。虽然民主政体的相互扯皮令人讨厌，而且印度的官场腐败也触目惊心；但这套体系能在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国扎根并正常运转，是印度为世界稳定做出的贡献。

新视角中的中印关系

21世纪初印度政府似乎认识到，与邻国没完没了的敌对影响到它的崛起；经济实力才是决定印度能否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因素。比如，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曾称“经济增长和发展抬高了印度的国际地位”，“世界正在冷战的废墟上构建新的全球秩序，印度将创造性地订立外交政策和对外友好，目标是为印度在世界事务中赢得一席之地”，“通过经济合作基础，印中关系取得进展”。

印度学者拉贾·莫汉就印度的变化做如下总结：印度不再有低人一等的病态心理，而且由于拥有核武器、改善对美关系、政治与经济尤其是IT行业的不断增强，印度现在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自信态度与中国打交道。

当然，印度对中国战略的评估也有助其转向。据印度国防部拟定的《远景规划报告》，

印度认为“中国目前正着手经济建设，主要精力放在台湾海峡，未来15年内难以对印度构成军事威胁”。

尽管中印关系有所改善，但依然处于重塑新基础的过程——在尚未摆脱历史阴影的同时探索双方的合作可能。换句话说，两国仍然在摸索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正常的”中印关系至少应包括：（一）官方非官方交往的机制化。（二）边界争端被隔离出来，谈判代表务实磋商寻求解决方案。（三）经济关系至少应形成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

（四）“中印敌对”与“中印合作”两端之间留存足够的空间，以便两国能够保留各自对国际国内问题的不同看法。

冷战后，印中两国在官方、民间交流方面虽然表现不俗，但这种交流的起点比较低，离机制化的目标尚远；两国的边界磋商虽然已经进行多轮，但是印度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不够，而且印度政治家的政治承诺可能受到国内舆论的有力挑战；两国间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但是目前双边经济关系水平仍比较低，更别说经济关系能构成双边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减压阀；两国总体关系还没有成熟到不受突发事件干扰方向的地步，友好和敌对之间回旋余地还需要拓展。

在印度的中国观中，如下观点也阴魂不散：中国与印度邻国“勾结”遏制印度的发展，迫使印度纠缠于南亚次大陆；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目标可能指向印度，地缘政治上会对印度不利；甚至有印度媒体渲染称印度的许多大河源自中国境内，处于下游的印度人可能成为中国的“人质”，如此等等。

研究表明，人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体系，倾向接收与其信仰体系一致的信息，回避、抵制与自己基本信仰体系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印度应该平静地看待中国与其邻国的正常关系，中国方面也不能放弃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权利。中国学者唐世平的观点颇有见地：“中国在南亚的战略不是要遏制印度，而是要保证印度在南亚的领导地位不威胁中国的利益。”中巴友好是中国在南亚地区不确定性尚未根除的前提下的一种有限的自我保护措施，它更是中国构筑周边安全环境努力中的一部分。

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曾就中巴关系的问题说，“只要它们不是针对印度，印度就不反对它们的友谊。”可惜，不少印度战略分析家的分析模式却是这样：只要中巴之间存在友谊，它们针对的就是印度。诚如前印度驻华外交官帕兰杰佩所言：“德里的大雾是在政治和心理上束缚着印度的人造出的一种雾，这种雾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我们似乎更多的是从想象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而且热衷于让我们自己蒙在陈旧的和过时的政策编织成的大雾中。”

在印度彻底改变其“消灭巴方任何企图与印度平起平坐的声音”的做法之前，即使没有中国的存在，巴基斯坦也会转向其他外部大国，这是国际政治的铁律。此外，中印关系要彻底“正常化”，还有待于整个国际社会的“零和”安全观的根本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中印关系往“异中求同、和平共处、不纠细枝末节、携手共同崛起”的方向发展是比较有前途的。